

下卷

魏斐德 著

[美] Frederic E. Wakeman Jr.

讲述中国历史

梁禾 主编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東方出版社

第1卷

黄国栋 著

THE HISTORY OF CHINA

讲述中国历史

第一卷

CHINESE
HISTORY

商务印书馆

下卷 |

魏斐德文集

[美] Frederic E. Wakeman Jr. 著

讲述中国历史

梁禾 主编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讲述中国历史(上、下卷)/[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著 梁禾主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060-3132-5

I. 讲… II. ①梁…②魏…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中国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9128号

责任编辑◎林敏

装帧设计◎正视文化 闫志杰

内文排版◎鼎盛怡园

讲述中国历史

JIANGSHU ZHONGGUO LISHI

[美]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著

梁禾◎主编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6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版次:2008年6月第1版

印次: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mm×1000mm 1/16开

印张:59 字数:900千字

书号:ISBN 978-7-5060-3132-5

定价:115.00元(上、下卷)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内大街166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下卷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的上海 (401)
- >> 熊月之 马军引言 (403)
17. 抗战时期的政治恐怖主义 (407)
18. 汉奸——战时上海的通敌与锄奸活动 (443)
19. 战时上海的走私 (484)
20. 美国警察顾问与中国国民党特工 (1930 ~ 1937) (518)
21. 关于南京政府的修正观念——儒家法西斯主义 (536)
- 第五章 关于中国史学 (573)
- >> 周锡瑞 引言 (575)
J. Esherick
22. 在南京与四位历史学者的对话 (578)
23. 来自中国的报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历史学 (584)
24. 反思清朝：西方关于帝国晚期研究中未解决的问题 (605)
25. 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611)
26. 跨国界的比较性研究 (615)
27. 中国历史档案新近解密 (622)
28. 关于中国档案和美国的近代史研究 (626)

第六章 国家与现代化	(645)
>> 傅高义 引言	(647)
E. Vogel	
29. 历史变化的模式：1839 ~ 1989 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650)
30. 朱瑞对澳门的占领与中国对近代早期帝国主义的回应	(685)
31. 关于认同与国家形成的反思	(696)
32. 中国的现代化	(701)
第七章 民族与革命	(713)
>> 裴宜理 引言	(715)
E. Perry	
33. 清末与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	(718)
34. 现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探寻	(744)
35. 叛乱和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间运动研究	(758)
36. 爱国者毛泽东	(806)
结 篇 讲述中国历史	(825)
[附录] 书评	(849)
1. 中国昔影	(851)
2. 中国表层下的深度	(858)
3. 红楼才子	(866)
4. 美猴王	(877)
5. 中国古老的妖术	(885)
6. 中国的鬼故事	(894)
7. 英国伯爵与中国皇帝	(903)
8. 皇帝新貌	(907)
9. 中国与十字路口的帝国	(912)

第四章

民国时期的上海



引言

熊月之 马军*

1927年到1945年的上海，尤其独特：政治权力多元，国际国内矛盾在此纠葛缠绕错综复杂；既有正常斗争形式（白道），又有非正常斗争形式（黑道）；有治，有乱。然而，魏斐德教授充分施展了他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从一般研究者重视不够的角度（警察控制能力、走私网等），将这一时期上海社会特点相当充分地揭示出来。他对当时国际国内大局形势的把握，对上海社会实际实况的了解，掌握资料之丰赡，分析之细腻，如烹小鲜，如理乱丝，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充分展示了一位学术大师研究城市史的非凡才华。该章节选入的这组论文，可分为两个主题，其一是“南京十年（1927~1937）”，其二是“战时上海（1937~1945）”。

（一）

中外史学界对“南京十年”的评价，由于评价者的立场不同，结论会

* 熊月之，江苏省淮阴人，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副院长兼历史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社会科学》与《史林》杂志主编，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委员，1998年被评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著有《章太炎》（1982）、《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994）、《上海通史·总论》卷、《万川集》（2004）、《冯桂芬评传》（2004）；主编《上海通史》（1999）、《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词典》（1997）、《圣约翰大学史》（2007）、《晚清新学书目提要》（2007）；论文有《论郭嵩焘》、《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晚清上海私园公用与公共活动空间的拓展》等百余篇。马军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上海史专家。

差距很大。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者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作“黄金十年”，在军阀时代的废墟上并面对外国势力，创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从而开辟了“中国的新时代”。反对者则把它描绘成一个软弱和动荡的时期，“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失地，丧权，辱国，并进而助长了后者的野心。魏斐德教授的研究对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显然持批评态度。

国民党执政之初，对于上海抱有极大期望。1927年7月在上海特别市成立典礼上，蒋介石声称不仅要把上海建成一个模范都市，还要把它变为完成孙中山国家建设计划的基地。维持秩序、建设市民文化与争取归还租界是特别市政府的几个主要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力量是一个现代化的警察机关。根据魏教授的研究，国民政府试图规范上海社会的行为并没有获得成功。其原因主要有四：第一，上海公安局没有集中有限的警力资源对付刑事犯罪，而是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蒋介石政权的政敌，主要是共产党人。第二，出于镇压中共的需要，中国警察放弃了收回租界主权的民族主义努力，转而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警察密切合作。第三，国民政府名义上表示要打击毒品，实际上则支持黑帮势力对上海毒品市场的垄断，并瓜分其利润。第四，新生活运动没有得到市民的积极响应，从而没有形成真正的市民文化。总之，上海模范都市计划的失败，是国民党国家建设努力的挫折之一。归根结底，一方面是因为该政权所掌握的有限资源难以应付内忧外患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它又执着于用警察力量来控制社会力，而不是去动员社会力，因此不能阐释出一个有分量、有生机的政治认同感，并借此发动一场以民众为基础的运动。

国民党政权对暴力、特务和警察的过分依赖是很著名的。魏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述了中国近代警察以及警察教育形成的历史，探讨了其受国外尤其是美国警察思想及技术的培训和影响。他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已介入中国警察特工的培训工作，培养了许多无恶不作的特工，后者则将学到的科学技术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运动。因此，将中美间的这种合作与后来的抗日成就简单地挂起钩来，显然是不全面的说法。

魏斐德对1932年初国民党内部成立的一个秘密右翼组织——力行社，也格外关注，对其脉络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力行社由黄埔系的骨干分子滕杰、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发起，伴之以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

会、复兴社、蓝衣社等外围组织，从最初的300人发展成为后来具有50万人以上的新的政治力量。该组织显然受到了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运动的影响。然而是否可以将力行社、蓝衣社等定性为西方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学术界则存在颇多的争论，魏教授则谨慎地采用“儒家法西斯主义”定义，以此概括其中西因素的混合产物。

(二)

战时上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态极其复杂，有日本占领军、傀儡伪政权，也有代表西方势力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可谓是多方角逐！从时段上分，先是1937年末国民党军队西撤后的孤岛时期，进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汪伪在前台，日军在后台，逐步全面占领上海。魏斐德主要从三条主线入手，以期从纷繁杂陈的各类事件中，揭示其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

其一是战时上海的政治恐怖主义，亦即主要在重庆势力和傀儡政权之间发生的大量的暗杀和暴力事件，其要角是戴笠领导的军统和伪政权下属的“76号”特务。魏教授通过对陈策、傅筱庵、席时泰等一系列案件的缜密考察，试图表明：尽管几乎每一次恐怖活动的执行者都声称自己代表着“正义”，尤其是重庆方面的锄奸活动，无一例外地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但实际上许多“理直气壮”的恐怖活动背后，往往隐藏着并不那么堂皇的目的。作者进而认为，1942年至1945年日军之所以能相对稳固地统治全上海，而没有招致市民的起义和公开对抗，是因为后者已对前一时段城市里数百起的血腥搏杀心惊胆寒，厌倦麻木，以致在心理上崩溃了。

其二是战时上海的城市控制。警察是城市控制的主要手段，作为警察史专家，魏教授可谓驾轻就熟。孤岛时期，有四种警察掌控上海，即日本警察、中国伪政权警察、公共租界警察、法租界警察。其争夺的焦点是沪西地区，亦即俗称的“歹土”。由于此地介于外国租界、日本军事力量和上海傀儡政权三者势力之间，而变得紧张而难以约束，从而成为犯罪滋生的沃土。在日本人支持下，伪政权警察加强了在沪西与租界警察的对抗，力图控制越界筑路区乃至整个租界的治安，以致双方时有冲突乃至枪击事

件发生。在压力之下，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作出重大让步，于1941年1月与伪上海市长达成了关于成立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的新协议。协议规定该总署归上海市警察局管辖，租界可以推荐外人聚居区的警官人选。汪伪政权控制沪西以后，虽然摆出了“清洁城市”、消除不正当职业的姿态，但“歹土”实际上并没有变成“良土”，它仍然是赌博、毒品、娼妓和绑架的渊藪。此外，保甲制也是战时城市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由于在日本殖民地中国台湾行之有效，故此引入上海。实施保甲制度的第一个步骤是户口登记，有户口则有良民证，每户有户长，户长向甲长汇报，甲长向警察汇报，邻居签保证协议互相负责，以此构成对基层社会的掌控。

其三是战时上海的经济困境。当时的上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米粮短缺、通货膨胀、走私盛行等等。魏教授把颇多的研究倾注于粮食问题。他指出：食米统制实际上是日军控制上海社会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日本人规定中国产的食米应供应日本军队和日本国内需求，上海、天津所需食米则由印度支那供应，而印度支那的大米又完全在日本人手中。根据这一规定，沪郊以及外省的大米不能进入上海市区，市民只能购买配给米，配额是每人每周1.5升，而这本来已经很不够的配额也不能正常供应。从1943年到1945两年间，市民通过合法渠道，只能在730天中买到140~150天的粮食配额，简直难以生存。事实上，正是数千名“跑单帮者”，以及人们痛骂的“米蛀虫”、“奸商”，出于谋生或牟取暴利的目的，靠贿赂、关系网和冒险，把粮食从周边省份走私进上海，从而维持了基本供应。魏教授进而又指出，当时的走私并非局限在上海和内地之间，实际上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全国性的走私网，双方都试图借此互通有无，并达成自己的经济、政治乃至情报目的。

抗战时期的政治恐怖主义

(一九九五年)

1937年的上海战役持续了三个月时间。^①它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足长的一次战役。^②1937年8月13日敌人在上海开战，在最初的几天内，带着强烈的抗战热情面对来自停泊在河内的日本军舰上摧毁性炮火的中国人民，把日本人赶回到了黄浦江岸。^③因为公共租界持中立立场，日军无法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侧翼包围，直到他们的远征军9月1日在吴淞江和浏河之间建立了第二战场。^④到十月，中国方面已经部署了71个师和几乎所有中央军的炮兵部队，共计50万人。^⑤日本军队拥有6个师和6个独立旅，仅有人数20万人，但是他们控制了空中优势、他们的炮火力量有绝对优势。^⑥闸北地区遭受了这一地区有史以来最为集中的火力

① 傅葆石在《消极、抵抗与投敌》一书中恰到好处的概括了这一战争，第2~5页。同样，但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描述可参见何理的《抗日战争史》，第101~103页。

② 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第1页。

③ 8月16日，蒋介石命令张治中将军“一举消灭敌人”，见孙有利（音译）：《中国和太平洋战争起源》，第91页。

④ 蒋介石深信中国人惟一能打败控制了领空和拥有超强武器的敌人方法，是让他的步兵打近距离的遭遇战，并死死守住。他相信中国士兵在意志、决心和抵抗方面都优于那些快速移动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见蒋介石在1937年9月13日给战区司令的急件，秦孝仪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二篇——作战经过》，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0~51页。更多的总体战略，参见同上引书中蒋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关于战略原则冗长且无重点的演讲，第44~48页。

⑤ 孙有利（音译）：《中国与太平洋战争起源》，第91页。

⑥ 在进攻上海的头4天内，在对付整个中国的防空火力和战士中，日本人损失了47架飞机，主要是重型轰炸机。他们仅在上海地区轰炸，直到8月31日足够的日本增援部队带来了空中优势。Hsu, *The War Conduct of the Japanese*, 2.

攻击，但是中国人民仍然以沉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精神坚守阵线。^① 11月5日，柳川将军带领3万士兵抵达杭州湾，并向中国军队右翼后方的松江地区逼近，打开了第三条战线，迫使国民党军队于11月9日开始沿沪宁铁路全线撤退，而日军飞机已摧毁了沿线几乎所有的桥梁。不再被闸北的瓦砾阻挡的松井装甲部队，将国军的溃逃变成了屠杀。在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死伤30万人；至12月12日南京沦陷时又死伤了17万人。^②

上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市：上海工业遭受的损失超过56亿元。^③ 难民潮涌般进入了仅有10平方公里的法租界、公共租界内，人口从150万猛增至400万，每户的平均人数达到了31人。许多人在市内各政治机构和慈善团体设立的175所难民营中暂避风雨，但是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仍然阻塞了街道，睡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寺庙内、仓库里以及同业会馆中。^④ 随着冬天的来临，疾病、饥饿和暴尸街头随处可见；岁末，从街头和废墟中找到了10.1万多具尸体。^⑤

然而，更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本占领军的包围下直至4年后的珍珠港袭击事件，“孤岛”上海开始享受表面上异常的经济繁荣。^⑥ 公共租界内的纺织厂以英、美公司的名义重新开业。^⑦ 利润翻了两三番，出现了七家新的纺纱厂。^⑧ 面粉加工厂增加了年生产量的百分之十。400家小企业——他们中的大多数公司都是从日本占领区迁入——在公共租界内涌现出来，生产工业化学制品、医用油、玻璃器皿、照明灯、热水瓶、手电筒、电风

① Hsu, *The War Conduct of the Japanese*, 4~11.

② 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42~43页；斯诺：《为亚洲而战》，第48~51页。

③ 何博文：《中国资本家》，3；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259。另见霍塞：《出卖上海滩》，313；安克强：《上海市政府》（Henriot, “Le gouvernement municipal de Shanghai”），324。中国主要银行业的损失对国民党政权造成巨大的打击。在战争前夜，中国银行的资产共有5,918,350,357元，其中5,593,794,057元落入了敌人之手，而整个“自由的中国”仅拥有324,556,300元、也就是全部的0.54%。

④ 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命令他的小舅子宋子文使用中国银行的资金救助上海的难民。秦孝仪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第二篇——作战经过》，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50页。

⑤ 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261~262.

⑥ 傅葆石：《上海的智力抵抗》（“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Shanghai”），第3~4页。

⑦ 1939年上海的丝织业、面粉加工业和棉纺织业的生产水平与1936年持平、甚至更多。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5.

⑧ 韩起澜：（Honig）《姐妹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工人》（“Women Cotton Mill Workers in Shanghai”），第27~28页。

扇、糖果以及香烟。因为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必须进口，因此轮船运输和保险业也增长起来。^①

这一繁荣景象部分是受了移民生存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包括从欧洲法西斯占领区逃离的犹太难民。另外一个需求增长的原因是日本人与内陆的“自由中国”之间的贸易。靠着那些十分容易接受中国商人贿赂的日本军官们的腐败行为而繁盛起来的经济，在1940年，仅这一年的贸易额估计就高达120万美元。^② 出口贸易也有增加，主要属于在上海的50家德国公司，他们将60%的茶叶、70%的芝麻、75%的植物油、40%的猪内脏、25%的蛋类产品以及其他上海市场上所有的皮革都运送到了处于战时经济的第三帝国。^③

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用夏衍常用的比喻来说，上海被认为是“48层的摩天大楼城市建造在24层的地狱之上”。^④ 现在，富有的战争奸商与无家可归的难民之间的对比更加明显。^⑤ 这暗示着在如此环境下，日本人能够相当有效地控制上海沦陷区域，巧妙地利用他们对“政府的间接机构”的熟悉程度弱化中国人的抵抗和保全国际合作。^⑥

这篇论文将论述中国人对傀儡政府抵抗的严酷及支撑抵抗的暧昧；政治恐怖主义如何与暴力犯罪危险地相互纠缠；介于外国租界、日本军事力量和上海傀儡政权三者间的三角关系如何紧张而难以控制；无人管辖的沪西地区犯罪欲盛行，既是对无法忍受的社会压力下的暂时逃脱，也是外国

① Oakes, *White Man's Folly*, 372 ~ 373.

② Eastman, "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278.

③ Oakes, *White Man's Folly*, 348 ~ 349. 在德国于1939年8月23 ~ 24日与苏联签订不进攻条约之后、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前，德国每月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送达10万吨货物。在1940年，中德贸易额总量达9700万美元，而上海占了总量的一半。至1939年2月上海至美国的出口量大约每月达100万美元，这几乎相当于侵略前1937年2月的出口总量。*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l, China 1930 ~ 1939* (Hereafter RDS), 893. 00 P. R. Shanghai/125 (Feb 1939), 17.

④ 夏衍：《包身工》（1978年北京再版），第26页。

⑤ 珍珠港事件后，富有的通敌者的超级阶层化更加显著，当“如果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苦难时，而它对少数人而言则是狂欢节”。傅葆石：《顺从、抗拒与合作》，第125页。

⑥ “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机构能够刺杀一些卖国者和日本人，但是被占领的上海与它的傀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阻止这类事件在上海的发生。许多中国人选择了西迁，而不是留在上海进行抵抗。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前，公共租界内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也愿意与日本占领方有些合作。”根据怀特：“非政府主义在当代上海的历史发展”，第48页。

控制下城市分裂溃烂的持续指标。事实上，“歹土”本身已经成为夏衍所描述的天堂与地狱间横向延伸的分界的隐喻。^①

萧 条

至1939年秋天，由难民潮驱动的1937年至1938年的经济繁盛开始一落千丈，那时日本人计划关闭长江流域的商业与货运往来的意图逐渐明显，因此上海与内陆的联系被切断了。^②1940年上海的股票市场失控。投机商将那些战争概念股炒到了离奇的高价，而交易则“伴随着每一次的传闻而跌宕起伏”。^③5月，囤积商以每包1000美元的价格存贮了大量的棉花在他们的仓库内，这些棉花原本计划通过法属印度支那送到欧洲。到月底，他们已经将价格抬高至2000美元。在6月25日，法国与意大利和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日本向在印度支那的新维希（Vichy）政府提出向来自中国的船只关闭海防（Haiphong）口岸。人为上涨的棉花市场坍塌了。超过50家的进出口公司破产了；预想中的利润再也不会有了，于是股市行情也一落千丈。^④“诈骗！大的诈骗，小的诈骗，如棉纱事件般的巨额诈骗，诈骗剥夺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危及到整个城市的生活。”^⑤

1941年早些时候，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它不同于对日战争刚开始后1937~1938年间高度分化的繁荣。预定旅馆房间几乎不可能（除了价格昂贵的华懋饭店之外），甚至得提前预订周末的电影票。夜总会总是挤

① “每个众人知晓的犯罪：细小的、政治的、合法的都滋生于此。” Oakes, *White Man's Folly*, 362. “管辖这一有争议的地区常常是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间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且好几次这种争议呈现出严重的态势。”“上海市长向公众允诺”，第2~3页。在美国人编辑的《密勒氏评论报》中广泛使用的词汇“badland”在汉语中被描述成新的词汇“歹土”（vicious land），这一词汇几乎与流氓一词“歹徒”（vicious follower）同音。

② 来自汉口的官方报告显示，1939年4月的数据显示自从日本人占领以来，事实上没有任何商业活动。同样地，在广东，珠江被禁止通航，重要的工业在衰退。Oakes, *White Man's Folly*, 375.

③ Oakes, *White Man's Folly*, 381.

④ Chang Fang-jen, *Chin-jung man-chi*（金融漫记），31。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棉花在合理价格上供应短缺。在上海的仓库内存储着25万包棉纱，但是几乎无人能够买得起。同上引书，第358，382~383页。

⑤ Oakes, *White Man's Folly*, 359.

满了人。“人们很容易想象太平日子又回来了——起码眼下如此。但实际上，上海已经在遭受着一场逐渐蔓延的毒害狂热，而且出现了不祥的生活用品积攒的混乱，在这里人们的确很容易患病。”^①这一狂热是通货膨胀的征兆，它同样的打击了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②如果说1936年上海工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的话，那么到1941年3月食品的价格为774；房租为385；衣服为503；燃煤为636；其他生活用品指数为599。^③南岛（Nandao，即南市），曾经在1937年11月日本占领上海南部后一度繁荣，也萧条了。^④

1940年记者奥克斯（Vanya Oakes）离开上海时，正值日本傀儡们在仔细甄别右翼与左翼，她能感受到人们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但是当她1941年回到上海时，却感受到了中国人精神的崩溃。她问她的中国朋友，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消极，竟接受日本人的占领？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大米。”^⑤据奥克斯说，日本以大米为武器控制上海，犹如希特勒利用食品供应控制欧洲的占领区一样。中国沦陷区士气的不断低落，与日本人夺取印度支那的大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中国农村所产的大米被用作了日本军队的粮饷，或者输往日本国内。因此，诸如天津、上海等城市便只能依靠来自印度支那的大米生活，于是，“当日本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几近600万吨的全部出口大米后，它当然就拥有了强迫中国沦陷区居民与之‘合作’的武器”。^⑥

这一武器也非常具体地被用作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例如，在1940年9月29日至10月18日之间，共有五起枪击日本人案件。为了报复，日本宪兵封锁了可疑地区的小弄堂，“将它们严密封锁，在某些地段持续很长时

① Oakes, *White Man's Folly*, 357.

② “从前花100元买的東西，現在需要365元。通过比较，工资仅仅增加了极少的一点。”同上引书，第359页。

③ 见“昂贵的生活费用”（*The High Cost of Living*），第13~14页。

④ 因为房租只有租界房租的八分之一，日本占领后的第一年，南市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新居民。CWR, 11 Oct. 1941, 153.

⑤ Oakes, *White Man's Folly*, 360.

⑥ 同上引书，360。自从1937年8月13日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上海居民的大米分配成了主要问题。当年12月，人们受到饥荒的威胁，由于若干大慈善家的善举，才避免了灾难的发生。见 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323~325.